

高校部分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

职教高就业率背后的重重隐忧

在日前举行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论坛上，与会的各大高校校长照着讲稿，宣读着自己学校所取得的一连串科研成果和发表论著的数量，代表们听得昏昏欲睡。当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走上发言席时，他的几句话让大家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叶建荣的开场白就是：“我的观点比较尖锐，大学校长最不愿意听。”他的发言几乎是与大学校长针锋相对。他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

叶建荣举例说，5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建议沁园集团上马一个家庭纯净水工程系统，他们听后非常振奋，立即送给对方一个万元大礼包。企业后来收购了一家公司生产相应产品，次年大规模上市，销售量一直上涨。

今年5月，企业又把这位教授请到企业“支招”，没想到他的报告与5年前如出一辙，企业工程师听后直摇头，认为按照教授的提议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场。说到这里，叶建荣提高嗓门告诉大家：“企业在这边，大学没有跟进，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论坛主持人介绍的一组数字也和大学校长们列举的科研成果唱了反调，而是印证了叶建荣的观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国内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有关方面也在想方设法加强产学研合作，但是成效不明显。对此，一些企业界人士认为，原因就在于高校的科研机制还深深地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迹——研发与产业脱钩，科技成果转化与绩效无关。叶建荣说：“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张武平的亲身体会是，“如果没有写出论文的话，即便产生几千元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也只会被认为只有应用水平，不具备理论高度，不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下一个年度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时就不具有核心竞争力。

眼下正在考察研究“金砖四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导向，甚至是在国家拨付项目经费的‘温室’中‘自娱自乐’。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国家给高校的科研经费，80%左右投向了应用科学项目。但在申请项目时，第一考量的是发表论文数，因为SCI论文发表越多，表示你的研究水平就越高。”

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该司副司长陈盈晖说：“高等院校用占全国16%的研发人力，不到10%的研发经费，产出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国际论文。”

张洪石在做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时发现，某班两名博士毕业后，一个在北京某著名大学工作，每年可发SCI论文七八篇，但应用专利专利少得可怜；另一个去了某科技大学的博士恰恰相反，每年有六七项应用技术专利诞生，但鲜有SCI论文发表。

据研究分析，问题就出在科研经费投资主体与评价目标上。上述第二名博士所在高校的科研项目除纵向有国家经费投入外，大部分经费来自军工集团或项目的横向投资。中科院这位专家举例说，如飞机、卫星材料科研项目验收时，根本不会考虑你发表多少论文，而在于这种材料做成的产品能不能上天。上不了天，发表多少论文都是纸上谈兵，难以蒙骗过关。”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

“现在大学教师最不愿意承接企业投资的科研项目，10个科研人员难有一个。”张洪石介绍，因为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可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就不一样，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项目产业化转化率是多少。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就干脆直接发几篇论文，‘空对空’过关，大家知道项目评审要么是给钱‘走过场’，要么是圈内人士‘自娱自乐’。今年OK了，明年包装一下项目大家再相聚。”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中科院政策所这位专家说。

浙江振亚控股集团总经理沈国锋表示：“80%的科研经费被‘玩儿完’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他就碰到不少大学里的“江湖”教授。他们把一些还是理论层面或实验室技术状态的项目，拿来找企业联合申报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或补贴。这是不少大学教授致富的一种途径。实际上，这些科研项目离中试与产业化阶段还非常远，但他们的各种理论与数据资料十分全面与系统。

同一个项目在好几个省市同时得到经费资助

据沈国锋透露，在不同省、市与企业联合申报项目获取国家科研经费，也是高校包装科研项目的一种策略。因为现在国家大力鼓励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从国家到省、市、县级政府都有大量的科研项目与配套

经费，比如哪个评审验收的技术成果，在杭州是填补市内空白，但到了苏州也同样属市内首创，就可以顺理成章拿到不同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

由于地方政府科研项目评审信息缺乏共享，他就遇见过一个在江苏省获科研经费资助的项目，到了浙江省同样获得国家经费资助。不少大学教授就钻这个政策空子，“玩”科研经费的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科研经费被一些利益关系人当做一种潜在的资源进行运作。拥有科研经费审批权的人，授意高校、企业今年哪个项目可以报，能拿到钱，然后从中共享利益。“把国家科研经费老是拨给自己的‘关系户’，那些真正需要得到经费资助的企业或项目却难以受惠于此。”这位浙江企业老总说。

以科技部公布的2009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计划）名单为例，公众所能发现的信息只有项目名称、作者单位与拟安排经费预算数额，更多的信息无从查找，社会各界难以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建议：“大学确实要反思这些问题，政府主管部门更应考虑解决问题。”

张洪石表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我国高校科研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不变革的话，将“涛声依旧”。他与叶建荣不约而同地建议，国家除了对高校基础研究项目直接拨付经费外，对应用科技项目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由项目业主单位或客户企业投钱，国家给予企业相应投资额的免税支持。因为企业奉行的是“谁投资，谁当老板，谁说了算”，“高校那些‘忽悠人’的科研项目就难以再去忽悠人了”。



自娱自乐

孩子入学已经一个月了，湖北黄冈的李先生却还在为儿子专业的事感到惶惑不安。今年高考后，李先生根据孩子的成绩帮他选择了省内一所高职院校，填报的专业是当前就业比较热门的机械类专业，但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让他作出决定后依然有些犹豫——3年后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呢？

李先生的担心也是众多职业教育专家和业内人士所思考的问题。我国的职业教育如何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千余所职业院校又将何去何从？

10月16日，2009年中国国际教育年会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内百所职业教育示范校负责人和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职教专家聚集一堂。大家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多数职业院校创造出稳定的高就业率而鼓舞的同时，也对机遇背后潜藏的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职教大洗牌“箭在弦上”

2009年9月11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就业率连续4年超过95%。统计还显示，2009年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达84%。

稳定的就业率，让不少职业院校的负责人感到形势乐观，甚至在招生宣传时，流传出“大学毕业生遭遇就业‘寒流’，职业院校毕业生抢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说法。

“这其实是一种盲目乐观！”一名与会的高职院校直言不讳。

2009年5月，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关于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问题研究”的课题组，在深入湖南、广东、山东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金融危机背景下，虽然职业教育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其吸引力并没有显著提高。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而言是契机，但一轮危机过后，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必将迎来新的危机。”中国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中心主任姚寿广发出“预警”。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研讨会上，姚寿广在主题报告中分析，过去15年，中国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新型制造业基地。至2008年上半年，这一地区以占全国2%的陆地面积和约10%的人口数量，创造了全国26%的GDP，吸引了全国52%的实到外资。

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上的，这也造成了成本的提升和外资的不断流出，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一进程。《2009长三角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长三角城市在金融危机下多项重要的经济指标都有下降，这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未曾有过。

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倒逼长三角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危机必将淘汰一批落后的工业生产方式，同时也会“催生”一批新兴产业。“一旦金融危机的尘埃落定，新的增长方式势必直接冲击传统的就业方式。”姚寿广说。

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袁洪志教授对

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在他看来，某些传统产业的衰落，人才需求的降低，必然导致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萎缩；新兴产业的兴起，人才需求的旺盛，将促使高职院校新专业或新专业方向的产生，尤其是产业向产业链中高端发展急需大量经营、管理、物流和外贸人才。

“职教洗牌箭在弦上。”袁洪志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的影响目前才刚刚显现，之前一些专家认为5-10年内职业院校将面临大洗牌，但现在看来，这一日程将大大提前，有可能两三年内就会发生，一些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及时调整思路的职业院校将会被市场淘汰。

职教发展能否实现三个转变

一个关于游泳的话题在研讨会上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在座会游泳的请举手？”轮到嘉宾席上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特莱姆顿特技术学院院长玛丽·索恩莱博士发言时，她首先问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台下齐刷刷举起的手，索恩莱博士出人意料地说：“事实上我不会游泳，但我参加了学校游泳项目的学习，还取得了A(最好)的成绩。”

“要教会学生如何在游泳池里学会游泳，而不是纸上谈兵。”中德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李大卫如是解读这一“隐喻”。

美国汤普金斯·科特兰社区学院院长沃尔特·波兰说，现在就要思考未来十年会出现什么样的职业，而要设计出未来需要的东西，就需要和研发的人进行交流，判断潜在的变化，来重新调整课程。中国的职业院校领导者们将其概括为“前瞻意识”。

姚寿广教授认为，当前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迅速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化，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职业教育必须实现包括办学方向、办学模式、培养目标等多方面内容的全方位调整。为此，与会专家在研讨会上也开出了一些具体“药方”。

向服务第三产业转变。姚寿广教授指出，长期以来，国内职业院校培养目标是面向工业企业，长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实则表明，就在2008年各项经济指标纷纷回落之际，除舟山外其他15个城市的第三产业增速均快于第二产业，南京更是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该地继上海后第二个服务业比重达到50%的城市。“这就意味着服务业中的技能应用型人才需求面临巨大缺口。”

向服务当地经济转变。在国内，即使中西部地区的学校毕业生也都千篇一律输送到东部沿海地区。美国社区学院协会副主席詹姆斯·麦肯尼博士介绍说，在美国，有1195家社区学院分布在全美50个州，社区学院开什么样的课程基本取决于社区学院在什么地方。

向提供终身服务转变。詹姆斯·麦肯尼博士介绍，与中国普遍都是就业前接受职业教育有所不同，美国社区学院入学平均年龄在29岁左右，高等职业教育不再是一种“学校到工作”的终结性学习，而是一种伴随着“职业前、职业中、职业后”的终生性学习。

据《中国青年报》

新闻时评

官员财产公开 每一小步都是飞跃

湖南衡阳市委近日出台的《关于拟提拔干部考察对象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新提拔的干部须报告本人、家庭成员年收入及家庭财产等相关个人资料，否则视为放弃考察对象资格。规定须报告的对象、须报告的项目，详尽细致。此前，湖南浏阳对拟提拔的75名领导干部在网上公布他们年收入、房产、投资、车辆等所有财产的做法，因为公开资料最齐全、公开方式最大众，而被称为“最彻底”的模式。

衡阳之举如何“定性”，会有专业研究的人士给出答案。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包括官员财产公开在内的任何问题上，“前面”的每一探索，都将为“后面”的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催生新的更加完善的蓝本和模式。官员财产公开，近年来愈发深入进入了公众视野，从新疆阿勒泰的“破冰”之时起，就已“开弓没有回头箭”。随着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江北区、湖南浏阳衡阳等地的跟进，官员财产公开更成滔天之势。诚如识者所言，若缺少中央自上而下的立法支持，这些试点固然有好的愿景，但最终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个见解很有道理。事实上，早在1995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表明了党和政府的鲜明态度。而官员财产申报作为制度在全国施行之前，各地每迈出一小步，以历史的眼光来衡量，都将是了不起的飞跃。

必须明确，人们呼唤官员财产公开，不是“窥私欲”的驱使，而是旨在期望用看得见的数据工具对官员的不明和非法财产、收入来源进行有力的监督，使腐败行为无处遁逃。官员掌握着公权力，这个身份要求其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务情况，正是这些义务中的一项。对官员本身来说，公开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幸在哪里呢？能够通过这种持久、自觉而无形的压力，减少权力寻租的主观动力源。财产公开的步履维艰，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官员本身素质的局限，他们对财产不敢公开、不愿公开，或者说还不适应公开。而申报财产涉及面广，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骏曾举例说过，比如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财产登记等制度，这些基础条件目前还不完善。因此，官员财产公开虽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还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把工作逐层逐步推进。那些先行试点的地方，一个普遍特点往往都是从“拟提拔”干部开始，一方面他们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另一方面，通过由他们开始接受清廉的新官场文化和规则，易于构建起一定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从“拟提拔”开始没必要耿耿于怀，要紧的是先易后难，把官员财产公开的步子迈出来。相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言，在枝节问题上的求全责备就显得没有必要。

客观上，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没有不可突破的障碍和困难，重要的是推行这个制度的决心。作为打造“阳光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作为反腐败的终端机制，财产公开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必须拿出这种决心。当更多的地方积极探索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付诸哪怕是范围有限的行动，这些涓涓细流也足以形成推动力量，当其汇归大海之时，官员财产公开离“全面开花”的那一天还会遥远吗？

南文

别让“专家谈房价”太当回事儿

“在美国，普通人五年左右的收入就可以买一套房子，可中国一年收入也就只能买几平方米。”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这与中国文化有关：两个小青年结婚买房，是双方父母掏钱，甚至双方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会掏钱。《第一财经日报》10月19日

对于翘首期盼房价下跌的中国城市居民来说，现实无疑是残酷的：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超过四成，其销售价格更是飙涨接近八成，中国房地产市场依然量价齐涨，一片红火。这还不算在内，从最近专家们对于房价的判断来看，未来的十年之内的房价走势似乎更为残酷，会一直持续地上涨下去。

在时下这个几乎开始对高房价“病急乱投医”的年代，非但政府频频开出“大药方”，专家精英们开出的“房价论断”也纷纷登场。2007年，房地产商冯仑表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住房需求，跟未婚青年推动房价上涨分不开。而前不久，“房价上涨，是因为‘丈母娘需求’”。这是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9月3日在成都参加“中国地产金融年会2009区域巡回峰会”时，对房价上涨原因的独到“剖析”。同样是在这个会上，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认为，国内楼市至少还要红火20年。从“未婚青年推动房价”到“丈

母娘需求”，再到如今的“房价与中国文化有关”，专家的观点让人瞠目结舌，着实看不懂。

理论上说，上述“比喻”是不无道理的。时下的“未婚女青年”和“丈母娘”的确有无住房作为是否结婚成家的重要“砝码”，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住房需求的扩大和延续。但专家们似乎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如果国内房价不是这么高得离谱，“丈母娘”又怎会把住房看得这么重？房子沦为婚姻生活的“重中之重”，完全是房价畸高引发的“苦果”——回过头来说是“丈母娘需求”和“中国文化”推动房价上涨，荒诞之极。所以，专家的“房价论”引起了公共社会的强烈反应，这一次也不例外。

关于房价，专家与大众的观点说穿了不外乎在于两点：一是前者经济能力高，感受不到房价的压力；二是后者迫切希望房价降，但前者却期待房价上涨——道理很简单，谁都希望自己手里的房产升值，专家又岂能例外？由此来看，专家们的“房价论”无非也是一种心理预期，用老百姓话说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恐怕其中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未必就一定是某种“利益代言”。而这，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精英富裕群体的心态。房地产市场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其实不必太当真，更不能将之当成房产消费的“依据”，大可笑置之。

陈一舟

向500强冲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日在京联合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中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较低，平均指数31分。按照指数的大小把企业分四类，得分在60分以上是领先者，得分40分到60分叫做追赶者，20分到40分是起步者，20分以下叫旁观者。结果发现，整体水平下来仅为31分，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总体水平刚刚起步。有40%的企业还在旁观，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参与实际行动都没有。

蓝皮书介绍，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远远领先于民营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焦海洋 文/图

